

谈 星(1916—1947)

谈星走过的道路是一条由革命青年、共产党员走上了戏剧家的道路。谈星是合浦革命事业的先驱者，他的名字在全国都是很响亮的。

谈星，原名何承蔚，又名何苇林，合浦县乾江乡杨家山村人，1916年农历4月16日出生于廉州城外圩地街（即今阜民北路）。父亲何锦昌是以打金银首饰为业，开间打银铺，既是老板也是工人，生活十分贫苦。两个哥哥都出外谋生，生活重担都落在老父亲的身上。谈星从小死了母亲，虽有了继母，家庭生活仍然十分贫寒。

谈星在1923年开始读小学，1929年考入廉州中学，1935年夏在廉中高中师范科毕业。他从小就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，写得一笔好字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经常得到学校奖励银杯银盾，校长老师也都很爱他。

家庭的贫困，社会的腐败，个人的前途茫茫，使得这位少年过早地成熟。他和杜渐蓬、何世权结成生死之交，号称“三剑客”。在谈星的家里，藏有一批革命书刊，如《向导》、《新青年》以及《共产主义ABC》之类。这是他二哥当革命军时买的，这就变成这三个人的革命启蒙书刊了。当时学校校长伍瑞锴、蔡振玮都是比较开明，买了不少进步书刊，特别是革命文艺书，给学生们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。廉中那时也陆续来了一批进步教师，如朱建予、王运应、黄闻百、李屏周等，给谈星等人很大的启发教育。以杜渐蓬为首的“三剑客”，并不以此为满足，他们还和广州的陈铭炎、陈任生、张进煊，上海的朱光、邹韬奋等人挂钩，获得不少革命书刊，如江西苏区出版的《新中华报》和《巴黎时报》，也经常获得阅读，思想方向逐渐明确。

1933年秋，由谈星、何世权两人发起，联合韩师淇、陈贻芬、吴裕春、李华良、曾德材等人，建立了一个名叫“艺宫学术研究会”的革命组织，读马列主义革命书刊，出版墙报和一份铅印文艺刊物《镭光》。当时廉中还有一部分思想保守的学生，依仗训育主任为后台，成立一个名为“神灯”的团体，和“艺宫”对抗，主要人物有庞乘风、林昆，双方辩论很激烈，但支持“艺宫”的同学占多数。“艺宫”由十多人、到几十人、最后发展到一百多人，如罗文洪、罗永玑、李华良、伍雍娴、吴裕春、邹瑜、王琼儒、伍雍谊、李廉东、黄国栋、张文纲、许家骅等，都是“艺宫”主要成员。到了1936年以后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使廉中同学的觉悟大大提高，原来“神灯”大多数同学，以朱兰清为首，跟“艺宫”携手合作，共同抗日。“艺宫”的建立和发展，对廉中的建党，作了很好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，谈星在这件工作上，作过突出贡献。

谈星和杜渐蓬、何世权三人，一般都是爱好文艺，但三人各有所长，谈星喜欢写议论文章，杜渐蓬喜欢写诗，何世权喜欢写散文和小说。在廉中，这三个人的文章比较出众，因此，群众很信任他们。他们不但创立了“艺宫”，后来“学生自治会”的领导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，直到他们毕业离开廉中。

1935年夏，谈星和何世权毕业了。这一年，杜渐蓬已到广州，考上中山大学，何世权到西场中心小学教书，谈星在县城暑期学校当教员，“三剑客”分手了。几个月后，“12·9”抗日救亡运动开始，接着广州的抗日风暴也掀起，留在家乡的谈星和何世权焦急万分，不愿混混沌沌过日子。1936年初，杜渐蓬从广州回来，动员谈星和何世权到广州去。1936年夏，这两人把教书所得一点积蓄作旅费到广州去，名为考大学，实际上是想寻求出路。在考入大学没法读书的情况下，这两人只好住进合浦学会去，谈星和他兄弟何世权还想当个卖文度日的作家。可是在那个社会，这只是个梦想，两人饿得连棉被都送到当铺去了。

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，还是杜渐蓬和张进煊，不但生活上资助他们，1936年9月，还介绍他们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—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（中青），并且引导他们参加“艺协”、“歌咏团”等抗日活动，使他们接近群众，投身革命。

1937年，对谈星来说是生活的转折点。他的好友何世权和张进煊回合浦公馆进行革命活动；心爱的姑娘也抛弃了他。他留在广州那间破烂的合浦学会里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。这一年夏天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经过党的安排，在七十二小学当校长。从此，他和少年儿童结下不解之缘。

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他在宣传方面，做了不少工作，其中最重要一件，是筹办了广州儿童剧团，以少年儿童为主人，通过戏剧、歌咏等艺术形式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。他自己担任团长，并且决心把自己一生献给此项事业。

在这段时间，谈星写了许多抗战歌曲、儿童歌曲，流传至今的还有十多首。他也编写好些话剧，宣传抗日救国，揭露日寇残暴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。许多场合，谈星是自编自导自演，因此，这个剧团在广州颇有名气。

1938年10月，广州沦陷，谈星带着儿童剧团最后一批撤出广州，沿着西江而上，经肇庆、梧州等地，坚持演戏宣传。后来到了广西桂林、柳州等十多个县市，还到桂南昆仑关前线，宣传抗日救国，号召军民合作抗日，同时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腐败，消极抗战。儿童剧团大都是十来岁的孩子，个别的不足十岁，广州沦陷，国破家亡，靠一双脚奔走几千里，经费无着落，饥寒交迫，仍然坚持抗日救亡宣传，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。谈星作为“孩子头”，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身上，那就更加困难。可是孩子都很好，团内政治空气很浓，团结友爱，对团长非常尊重敬爱，为此，朱建予老师，还亲自把自己的女儿送来参加剧团，使之得到锻炼。

可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，连孩子也不放过，不仅断绝剧团的经济给养，还处处派特务跟踪捣乱。1942年1月，国民党第四战区派兵将儿童剧团从桂林押解到曲江，逮捕入狱，分别审讯，毒刑拷打，一定要孩子们指控谈星是“奸党”、“坏蛋”，孩子们无一屈服。谈星受刑更重。剧团被解散，谈星和主要人员被关押在监狱两年多。在监狱中，谈星的爱人方凌生了个孩子，无力抚养，只好送给人家。

1944年11月，日寇窜犯粤北。曲江沦陷前，监狱看守人员逃跑一空。谈星夫妇和难友们

越狱出来，到英德县找到党组织，本想参加我北江支队，但因刑伤太重，体力难支，得到党的安排，送到香港就医，稍好时，在一间书店当编辑。1946年，罗文洪到香港报告工作时还见到他。可是，谈星受的摧残太重，疾病缠绵，终于在1946年冬在香港病逝。

1984年9月18日，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和广东话剧研究会，在广州市召开一个广州儿童剧团成立四十五周年大会，参加的有来自北京、内蒙、南京、广西等地原儿童剧团成员。广东文艺界知名人士左洪涛、李门等，老戏剧家吕复、吴荻舟发来贺电。大会对广州儿童剧团和谈星同志作了高度评价，还展出谈星巨幅照片。谈星在戏剧界享有很高的威望，广州儿童剧团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。我们也为合浦培养出这样具有全国影响的优秀的人才，感到骄傲、光荣。

谈星的爱人方凌，孩子名宜章，都在广东工作。家乡只有兄妹侄儿侄女们。